

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sup>①</sup>

在这些讨论中,我终于理解了这套书(吴齐本)的重要性:在阐释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也要重视世界历史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既要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而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又要揭示人类历史从各地区之间的相对闭塞到逐渐开放、从彼此相对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为息息相关的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这种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交叉的互动关系。揭示这种交叉关系,则是一个难度更大的课题。历史在纵向上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向横广发展。例如,资本主义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世界市场,不会有广泛的殖民活动;反过来,横向发展又影响纵向发展,有了广阔繁荣的世界市场,才有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才有了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和那个直到今天仍令英国历史学家无限追念的维多利亚王朝;然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对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区的发展又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

据此编写的世界史,不同于“周吴本”,不仅将中国放入其中,而且在近代史编和现代史编中,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等等。这些在世界通史编写体例方面的重要变化和创新,不仅更符合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也解开了我的困惑,初步回答了上述提出的各种疑问,并提供了更多的至今我都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教学与科研问题。例如:如何阐述和评价近代早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以及横向发展中的作用的认知与理解;如何评价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内与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如何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如何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冷战;如何理解全球化进程;如何理解非殖民化运动,等等。

1993年吴于廑先生在人们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遁归道山,并未看到这套书的全部出版,令人唏嘘不已。但是他提出的这种整体的全球的世界史观,不仅开创了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的新局面,开拓并发展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教学与科研课题,而且引发了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新思考和新探索。吴先生在学术上的这种不断进取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观学术渊源的探讨

刘景华

吴于廑先生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这一整体世界史观的萌生,最早见之于1964年他所著的《时代与世界历史》一文。这在时间上与西方学者提出全球史观如英国学者巴勒克劳夫撰写《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6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1963年),斯塔夫里阿诺斯推出《全球通史》(1970年代初),基本上是同时的。

与麦氏和斯氏主要以对世界史进行新的总体性叙述、在宏大叙事中体现其全球史观不同,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观从理论上做了专门的阐述和精心的建构<sup>②</sup>。不仅如此,他还深入探讨了古今史家世界史观的演变,分析各个时期世界史观的成就与局限,追溯整体世界史观的学术渊源,从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构建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世界历史实际的整体世界史观。这是西方全球史观论者所没有去做的。

吴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这样说包含两层意思:一、历史学家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540~541页。

②主要由5篇重要论文构成,即《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世界历史》、《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均见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选择的主题和对主题的论述,都不能不受到历史环境和他本人在这个环境中所处地位的制约,不管主题是属于当代的还是以前的历史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材料、解决办法,都会间接反映出时代;二、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还要受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制约,其内容、方法、视野、思想都不能不受这门学科已经有的成就的制约,即其前驱者的制约。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历史这门科学上的一个环节。不管其从事者是否意识到,这一制约是客观存在的<sup>①</sup>。吴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任何史学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学科背景。吴先生整体世界史观产生的时代背景无需本文细论。而他对世界史观学术渊源的探讨,则是整体世界史观产生的重要学科背景。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学术渊源的探讨,集中在一些重要论文中<sup>②</sup>;他研究近代西方史学的若干篇论文和授课讲稿,也较多地阐述了这一主题。吴于廑先生的这种探讨,本文拟从四个方面予以概述。

## 一、上古史家开始写世界史,并出现了世界中心思想

吴于廑先生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史家”。即使是上古时代,史学家也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也就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来写作世界的历史。如“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吴先生认为就是当时的世界史,其范围除了希腊及爱琴海诸岛外,还包括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伊朗、黑海沿岸及部分内地、地中海中部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也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历史》的主题虽然是波希战争,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大小的一个世界的世界史。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波里比阿,把自己卷帙浩繁的40卷《历史》,看做是为“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记载时代的巨变而作的,因之不言而喻,也是一部世界的历史。又如稍晚一点的中国汉代司马迁,也可以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解读他写的《史记》。《史记》记叙的范围,也是司马迁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司马迁还用中国人已熟用的“天下”一词来表示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几次称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个“天下”除了当时的中国疆域所及的地区外,东边还包括了朝鲜,西部包括了大宛、大夏,以致安息、条支,即今中亚、伊朗、叙利亚一带<sup>③</sup>。

受地理条件的局限,古代史家所能看到的世界是不大的;但即使这个不大的世界,他们也认为有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就是他们自己所在的民族或国家。吴先生说,如希罗多德书中最大的主题,就是扬希腊人的声威,特别是歌颂雅典,渲染波斯“蛮人”的败北;即使是写波斯人多么强大,也是为了衬托希腊人这个主体。按照希罗多德的描写,波斯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水师以及附属部队,加起来大约有500万人。他们进入希腊东北部的时候,把河里的水都喝干了。本来希腊山多,下雨时河水容易迅速流入海中,而且夏天地中海式气候是干热,所以河水夏天易干,这是希罗多德家乡的气候与自然条件,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写显然是宣扬波斯这样强大的敌人,也被希腊人打败了,可见希腊人有多么伟大。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波里比阿,具有关于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年)作为自己叙述的起点,认为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吴于廑先生认为,这一认识是十分可贵的<sup>④</sup>。但吴先生又指出,波里比阿毕竟是丧失了自身独立而依附于罗马统治阶级的希腊贵族代表人。他以浩瀚的篇幅论证了一个主题,即罗马统治这个世界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为了这个主题,所有关于迦太基、埃及、希腊、叙利亚等的论述,都不过是烘云托月而已。他把罗马侵入亚洲,看做是有统治之才的罗马人对于亚洲人的赐福,是把亚洲从蛮族的暴行中解救出来。所以,波里比阿描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树立罗马秩序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边缘上的蛮族,只是一些不知礼法的顽民而已<sup>⑤</sup>。中国的司马迁也与此相似。司马迁笔下的“天下”(世界),是存在夷夏之辩的天下。这个天下是汉人的舞台。仅仅是在这个舞台的边缘,才有汉以外某些民族或国家的咫尺之地,

①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4月19日,课堂笔记(刘景华记录)。

②即《时代和世界历史》、《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及《世界历史》,均已收入《吴于廑文选》。

③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13~14页。

④《吴于廑文选》,第42页。

⑤《吴于廑文选》,第5页。

而且他们还是汉天子怀柔的对象。他们作为“蛮夷”，理当沐受华夏的教化。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内乡”两个字，充分说明了一种以上国自居、以天下中央自居的思想<sup>①</sup>。

与古代世界史家主要受地理局限不同，中古时代的史家们所描绘的世界只是与他们宗教相关的世界，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在他们的宗教世界之外还有别的民族、别的种群存在，但他们视而不见。在吴于廑先生看来，这种态度，在中古伊斯兰阿拉伯史家和西欧基督教史家那里比较突出，他们“为各自的奉教世界写下了鸿篇巨制，对不奉教的世界却视若无睹，或者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阿拉伯史家塔巴里所写的多卷本《年代记》，所记叙上自真主创世，下至公元915年，内容详博，被称为是世界史，但范围却没有超出伊斯兰教传播和征服势力所及的世界，显然没有顾及他们已经略有所知的东亚、南亚和欧洲。这种世界史观，到14世纪还没有基本改变。被认为是伊斯兰史学史上最杰出的世界史家伊本·赫勒敦，也并不为全人类立说，依然把伊斯兰教树为世界的界石，只不过他的世界中心已经西移，从塔巴里所认为的巴格达移到了埃及和北非而已。他也写了一些非阿拉伯民族或国家，但它们要么只是阿拉伯世界的扩大，要么是阿拉伯世界的敌人<sup>②</sup>。

中古西欧基督教史学在这一点上尤甚。基督教史学开创于公元4世纪，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西欧占主流地位的史学。所谓基督教史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史学家主要是一些基督教神学人士；二是史学的主要思想观点是神学史观，史学是神学的工具。基督教史学用宗教史观支配一切，把基督教的历史当作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世俗的历史只是从属的历史，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基督教的胜利史。吴先生认为，这些基督教史家，是在遵照所谓神的要求，为历史上的世界划定疆域。这个世界始于上帝创世，希伯来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早、最圣洁的土地。后来福音传入罗马，把罗马这座撒旦之城改造为教皇化育万民的中心，于是世界的疆域西移，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也就是沐浴基督教“神恩”的以欧洲为主的历史<sup>③</sup>。

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攸西比厄斯(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作为宗教界领袖与君士坦丁皇帝并坐)，尚在其《编年史》中将世界历史分为两种：一是“神圣的历史”，即希伯来—犹太人和基督教史；二是“世俗的历史”，即那些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希腊、罗马的历史。但到了奥都斯丁那里，世界历史的过程不再是人类目的的实现而是上帝目的的实现，因而历史的进程必须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由上帝做出安排。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上帝战胜恶魔撒旦，世俗权力最后屈服于教会力量、神的力量，世界就不断进步。人类是一个整体，都要服从上帝的意志，所有民族都要朝着上帝之城前进，都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执行上帝使命的教会必将统治全世界。12世纪日耳曼史家奥托的《双城史》，叙述从上帝创世到公元1146年的世界历史，认为一部世界史就是“上帝的王国”与“世俗的王国”之间对立的历史。世俗国家的历史就是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四大帝国的历史。这是魔鬼撒旦的信徒们的历史。到他所处的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已与上帝之城趋于融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奥托的四大帝国说来源于《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但以理书》，书中曾说到但以理梦见四大兽从地中海上来。兽者，非为人类也！吴于廑先生指出，在奥托这类世界历史体系里，非基督教国家和文明几乎完全被蔑视：亚述、巴比伦已遭受了天谴；古典希腊是邪说的渊藪；伊斯兰文明中心开罗也是“巴比伦”——魔鬼和一切邪恶的代称<sup>④</sup>。总之，他们对于已知的世界，也“从来不是作为一个世界来看待的”，“看一半不看一半”，“或者善为青白眼，同于我者视之为宗亲，异于我者视之为仇虏”<sup>⑤</sup>。

因此，从上古到中古没有真正叙述世界历史的史家，要么是因为地理视野的局限，要么是由于思想的偏狭。地理视野的局限较易突破，思想偏狭之谬种则留传久远，故晚至18世纪初理性主义时代，还有“紧依神学”的法国历史家博叙埃，其所作《世界史述》还有“人类历史最后决定于上帝意旨的妄说”<sup>⑥</sup>。

①《吴于廑文选》，第4页。

②《吴于廑文选》，第5~6页。

③《吴于廑文选》，第6页。

④《吴于廑文选》，第6页。

⑤《吴于廑文选》，第7页。

⑥《吴于廑文选》，第238页。

## 二、近代欧洲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但随之也出现了西欧中心论

近代欧洲史学开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到16、17世纪时,由于航海探险殖民活动使欧洲人知道了美洲大陆,也知悉了东方文明,人们的地理认识局限应该不再存在了,因此写作包括整个人类的世界历史的著作也出现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家开始觉察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整体性,认为人类历史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应是一个整体;他们开始明确提出世界历史有中心的思想,当然也不否定中心之外的存在。15世纪威尼斯历史学家萨贝利科的著作《恩奈阿德》,被吴于廑先生认为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sup>①</sup>。16世纪法国史家鲍杜安在《世界史的结构》中,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仅在时间上是世界性的,而且在空间上也应是世界性的。另一名法国史家勒卢阿已有明确的世界历史范围在扩大、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思想。在他的眼中,世界已扩大到所有种族,世界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整个地球。他的著作中还开始体现世界历史中心的思想,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从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西欧各国的变化,这是近代欧洲人西欧中心论的最早萌芽。政治思想家波丹在《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亦构筑了新的世界史理论,认为人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可以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基础划分世界史的阶段;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各地区贸易的联系不断增多,促进了统一进程。

18世纪的理想主义史家们对世界史的考察和思考更深入了。吴先生指出,18世纪西方的理性主义是17世纪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理论概括。笛卡尔的《方法论》把得到论证的科学道理上升为理论,认为只有数学才能做出精确无误的推绎,自然界一切现象都可用数字来计算;欲探索规律,数学是主要的,依靠数学推演即人类理性。这一观点是影响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的开端。很快,崇尚理性成为一个时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理性主义史学是这种学术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体现<sup>②</sup>。伏尔泰对理性主义史学有很经典的理论阐述。伏尔泰把历史区分为“外部的历史”和“内部的历史”。前者是指历史现象表面的记述,后者指历史本身的记述,历史学应该从前者向后者转变。战争、条约之类属于前者,后者则应把人类过去的社会形成的艺术、文化、习俗记述下来。历史学家应当阐述历史事件的精神,不必回避细节,应当说明文化等积极成果,这实际上都是人类理性创造的成果<sup>③</sup>。伏尔泰历史思想的核心就是用理性来解释历史,认为人类是在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是人的理性和反理性冲突的结果。已形成的一些风化习俗不符合人的理性,应该使其符合,由这种不符合到符合便是历史的进步。

就世界史观而言,吴于廑先生认为伏尔泰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伏尔泰的《各国风教通义》,“实际是在当时条件下试作的一部世界历史”,经20余年增补,是其“已成定论的世界史观”。伏尔泰认为,世界史的基本任务就是证明“人们通过哪些阶段从先前时代不文明的野蛮状态进到当代的文明”。伏尔泰所酝酿的世界史,为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第一,从纵的方面说,世界历史应当从哪里开始?第二,从横的方面说,世界史应当怎样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第三,这样一部世界史将给人们以怎样新的教导?伏尔泰彻底否定了基督教史学的上帝创世为人类历史起点论,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世界史的最早起点,认为中国民族的根源在基督教的所谓洪水时代以前,因此中国文明为世界最古的文明,可视之为世界历史的起点。当然,伏尔泰的这种起点说,也是借对中国历史的重视和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来加强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既然中国为世界历史的起点了,那么世界历史的范围自然也就超出欧洲了,还要包括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中国儒教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秘鲁印第安文明等。这样,伏尔泰是“第一次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论述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他“留下一个新世界史观

①《吴于廑文选》,第43页。

②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4月19日。

③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5月3日。

的初步纲领”,第一次提出一个基于人的理性、基于世俗主义的对世界历史的看法<sup>①</sup>。当然作为初步纲领,伏尔泰对形成世界史体系的要求来讲,意义还是有限的。他从中国讲起,也可能是对远方历史的了解带有好奇心,将之理想化,认为中国有宗教宽容,不派传教士,不强求改宗归己。伏尔泰对文明还没有完整估计,有自我矛盾:一方面尊崇孔子学说的中国,另一方面,他所说的文化灿烂时代均在欧洲,即希腊时代、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路易十四时代<sup>②</sup>。这似乎还是朦胧的欧洲中心论。

从世界史编纂上说,18世纪德国的哥廷根学派受理性史学影响较大。吴先生指出哥廷根学派对“世界史”概念进行了新的论述,并在世界史编纂上有重要实践。他们原本想借助英国的一部38卷本世界历史汇编,译成德文,后发现严重缺陷,未翻下去。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加特勒尔著有《世界全史》,对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作了较好分析,如蛮族入侵、美洲发现等,但存在的局限是仍未放弃创世观。该学派的另一史家施罗泽尔注重审订史料,尤其是对北欧、俄罗斯的史料作了较多工作;他还更新各国历史,编著世界历史,不过写的一部世界史并不成熟<sup>③</sup>。缪勒尔是施罗泽尔的学生。他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但他把它解释成了欧洲历史的统一性,“只关注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实则是“西欧中心论”的始作俑者。故而阿克顿(《剑桥近代史》主编)称其为“第一个世界史家”<sup>④</sup>,正是“西欧中心论”使阿克顿感兴趣。而德国浪漫主义史家赫尔德,也是早期的西欧中心论者。他认为,中国、印度和美洲土著的文明,都是静止的、非历史的;只有在欧洲,人的生活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才能发展为高级的形式<sup>⑤</sup>。

西欧中心论正式发端于哥廷根学派,到19世纪黑格尔和兰克时发展到了顶峰。吴先生指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部书里,主张把中国和印度置于世界历史的局外,把波斯和埃及看作是向世界历史的过渡,而希腊的精神才真正是世界历史的开始。尽管他在书中把“东方世界”列为第一部分,看来好像是从全世界着眼了,但实际上列出东方是为了否定东方,根本就不让在世界史上插足<sup>⑥</sup>。至于兰克,吴于廑先生认为,兰克把拉丁日耳曼各族视为一个独特的整体,实际上就是“西欧中心论”,这是兰克一生历史思想的三个特点之一。另二个特点分别为重视史料来源并对其进行辨析,即批判史学;写作历史是使历史复原为本来面目,即客观主义。他晚年写作多卷本《世界史》,不愿正视古代东方学已取得的丰富考古成就,实际上只是以西欧为核心的历史加以扩大而已,并不比哥廷根学派进步<sup>⑦</sup>。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中心论是西方历史学思想的主流。把欧洲看做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西方史学中成了根深蒂固、不可移易的思想。这在当时西方几部主要世界史著作中有充分的表现,如威廉士等编纂的《史学家的世界历史》、法国的《人类的进化》和英国的剑桥三史,皆是如此。当然,从20世纪初起,首先也是从西方发出了反对西欧中心论的声音。然而即使如汤因比,看到了欧洲之外还有许多非欧文明,并力图将所有的文明进行综合考察,但他也只是别具一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他给这个思想披上一件炫目的外衣,让人相信世界的历史就是许多文明生生灭灭而最后是西方文明胜利和独存的历史。正因为这样,汤因比对西方文明能否长存而忧心如捣<sup>⑧</sup>。至于那位早于汤因比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不愿意看到西方文明真的没落的残酷现实,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吴于廑先生特别强调,在反对欧洲中心论时,不要试图用别的中心论去取代欧洲中心论。如果那样,这种争论就会无休无止,而欧洲中心论仍旧可以屹立如故<sup>⑨</sup>。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见解。

### 三、西方史家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和路径可资借鉴

尽管近代以来西欧中心论盛行,但西方史学界研究整体世界史的方法和路径值得注意,吴于廑先生

①《吴于廑文选》,第237~244页。

②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5月24日。

③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5月24日。

④《吴于廑文选》,第237页。

⑤《吴于廑文选》,第9页。

⑥《吴于廑文选》,第8~9页。

⑦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5月17日、5月31日。

⑧《吴于廑文选》,第9~11页。

⑨《吴于廑文选》,第11页。

对这一点进行了强调。

在他看来,研究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应该先从广泛的问题入手,有一个雏形的全局,然后再对一些关键时代、关键问题、重要国家进行具体细致的研究,最后归结到对世界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吴于廑先生正是这样展开他的整体世界史研究与探索的。因此,吴先生除了自己从全局论述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外,还率领研究团队展开了对15、16世纪世界史具体问题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国家有此时期前后东西方的典型国家英国、法国、中国、日本,以及东西方的航海活动,其主题是“由农本而重商”,其内容是“15、16世纪东西方社会经济综合比较”,先后出版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共三编<sup>①</sup>。

吴于廑先生虽然认为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并不客观,不但是其史料主要来自官方档案,“倚着内阁的窗口看历史”,而且充满了西欧中心论,但他对兰克研究世界史的路径则予以了一定的肯定。他认为,兰克对史料的搜集和批判并非终极目的,终极目的还是在于进行综合性考察和整体性研究。

兰克是从考察西欧全局开始的。他的成名作《拉丁与日耳曼各族史》考察六大民族,即日耳曼、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斯堪的那维亚,认为这是一个统一体。但它不等于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体,因为后者包括有亚洲甚至非洲的基督教徒;也不同于欧洲统一体,因为欧洲统一体中,包括了从亚洲去的土耳其人(控制了东南欧),以及俄罗斯人(19世纪西欧人认为俄罗斯不是欧洲人,甚至认为是亚细亚人);也不同于在拉丁教会(天主教)下的基督教统一体,因为后者包括斯拉夫人(如波兰人)、立奥尼亚人。构成这一日耳曼民族统一体的有三个共同点,兰克称之为三大呼吸,即:民族大迁徙;十字军运动;近代(16世纪以后)殖民,实际上是指这六个民族从据有西欧这一片土地、直到他们向外扩张;十字军时期是小扩张,近代殖民扩张逐步遍及世界,是大扩张。

兰克在早年做了总的考察后,又对各重要国家历史逐个研究,重点都是在16、17世纪,即最后的大呼吸时期,写作了《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十六十七世纪的法国史》和《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史》等。

到晚年时,兰克则做更大的全局考察,83岁时着手编写《世界史》。《世界史》写了7卷,没有最后完成,古代部分有4卷,讲了西亚,但没有注意到埃及学、亚述学当时的成就。这些成就已有半个世纪,兰克不可能不知道。他把世界古代史的主体肯定看成是希腊、罗马。第7卷写到12世纪初年德意志皇帝时期,最后两卷由弟子整理到1453年,再后面的只好拿以前的著作加以补足完成。他晚年的观点及其历史思想,与年轻时期《拉丁与日耳曼各族史》基本是一致的<sup>②</sup>。

吴先生对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发展方向也有类似评价,认为西方历史学在黑格尔和兰克那里,是以对世界历史做概观为主;到19世纪后期,受兰克批判史学的影响,西方兴起了专史研究;20世纪初期,在专史研究基础上,以及针对专史研究的不足与局限,又兴起了对全世界历史做综合考察的“新史学”和形态学派。

在兰克及其学派影响下,19世纪中叶起西方逐渐“文史分家”,历史成为独立学科,西方各国收集、校订、编辑各种文献成风。德国编的《日耳曼历史文献总汇》,共120卷,英国编辑中世纪卷宗,全称《中古时代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编年纪及历史实录总集》,共243卷。法国出版《法国未刊历史文献集》,290卷。其它如比利时、匈牙利、波兰都做了类似工作。很快,西方还出现了以兰克思想为指导的专业历史刊物。如德国的《历史杂志》(1859年创办),说要“阐明历史科学的真正方法”,即客观主义史学方法。《法国历史评论》(1876年创办)“只接受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以原始材料进行研究或结论可丰富认识的创新之作”。《英国历史评论》(1886年创刊)的卷首语说,“发现和陈述史实,不发表对现有知识无所增加的文章,也不包括对专业历史学家没有价值的文章”。

随着兰克史学方法的推广,历史学发展有了新方向,这就是研究分工越来越细,专题化,专门化。兰克以后,从政治史向新的领域发展,即法律、文化、经济等等。如有斯塔布斯对英国宪法史的研究,梅因

<sup>①</sup>除上揭第一、三编外,第二编由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2005年再版。

<sup>②</sup>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5月31日。

对古代法、对农村公社的研究,西伯姆对英国农村公社的研究,维诺格拉多夫对维兰制的研究,卡宁汉对工商业的研究。德国出现了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学派,如罗雪尔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施摩勒尔对工业的研究。另还有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文化的研究等。

在吴先生看来,这些研究一旦取得成果,就会带来超越兰克学派的新发展,主要包括:1. 关于历史的主题和范围。专门史研究发展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研究等得到开拓。经济史研究回答的是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水平及其动态。文化史研究探讨人的思想意识。政治史则是回答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各种社会关系。专门史本身是狭窄的,但对整个历史学科则是研究范围扩大了,使史学开始包罗各个方面。2. 关于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如社会制度史和经济史不是注重个别的人物和事件,社会是不同阶级的人群集合体,注重社会的整体或某一个方面。由此形成的历史观念认为历史不是个人的历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变成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历史。3. 关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描写人物,往往是特殊性胜于一般性,影响到写作体例,只能如实叙述,成为描述的历史。制度、经济、风俗的研究则有一定的延续性、稳定性,人物活动往往是重复出现,多次起作用,这就容易考察其共性。它们涉及的人物是大众的人物,如研究庄园涉及农奴、庄园主,研究行会涉及学徒、行东,这是共性研究,不停留在对个别人物的准确描述上,而是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sup>①</sup>。

吴先生指出,史学的这种分工、精细化,是必要的,但必要的并不一定就是终极的。专门研究发展后,一定会提出汇集各方面成果、进行总体研究的任务。综合概括是专门研究后的必然发展方向。历史研究必定要经历两个阶段,从对观察个别事物、现象、材料、数据入手,然后进行综合概括,寻求研究对象的共同点,和支配这些现象的本质因素,从而得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19、20世纪之交时,西方史学的这一趋势日益明显。“新史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出现的。“新史学”出现于美国,是对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派。他们强调,任何理论概括都是有条件的,但专门研究不等于就是综合研究<sup>②</sup>。

而形态学派则被吴先生看成是一个跳出了西欧中心论,对世界历史进行综合考察、进行全局考察的学派<sup>③</sup>。先生对形态学派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剖析:

形态学派有三个代表人物。19世纪中叶俄国丹尼尔夫斯基提出了形态学派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每一个历史文化型都有本身所具有的特色;二是每一个文化型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周期。丹尼尔夫斯基认为,每一个文明虽然可以受其他文明影响,但其特点总是保存着的,总是不会被湮灭的。丹尼尔夫斯基的看法有两点意义。其一,既然各个文化型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而欧洲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文化型当中的一个,那么,从全世界历史来讲,这个欧洲也就不能凌驾于其他各个文化型之上,这样,西欧中心论便难以立足了。其二,既然欧洲型文明也有不可避免的模式,即也要走向衰落,那么“西欧中心论”便很难站住脚。丹尼尔夫斯基跳出西欧来观察全世界,对19世纪特别盛行的“西欧中心论”是一次冲击。

斯宾格勒是德国历史哲学家,其《西方的没落》的出发点是对全人类的历史做考察,20世纪初,随着西欧这个“中心”自身矛盾的加剧和激化,特别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西欧历史以及世界历史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于是,彻底破除“西欧中心论”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潮流,斯宾格勒就是位站在潮头的历史学家。他首先提出了对世界历史的观点和思想。他认为,世界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历史的世界,另一种是作为自然的世界。作为历史的世界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方面,具有极大意义,但总是不被人们所察觉和重视。其实,这两种世界是很不同的:历史的世界是有机的,自然的世界是机械的;历史世界的内容是形象,自然世界的内容是法则;历史世界的内容用符号或图象来表现,自然世界的内容用公式来表现;历史的世界是纪年的,自然的世界则是数量的。因此,要说明历史就不能简单地运用物理学的方法。物理学的方法是用来说明因果必然的,是空间的逻辑。在因果必然之外,还有一种必然,这就

①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5月24日。

②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5月31日。

③对形态学派的论述,见吴于廑:《近代西方史学选讲》讲义,1984年6月7日、6月14日、6月21日;并见《吴于廑文选》,第277~296页。

是生命的有机的必然。说明这样一种必然,则还需要时间的逻辑。实际上,斯宾格勒在这里对 19 世纪的主要史学流派(即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总的倾向予以批判和否定。

斯宾格勒除了只是把西方文化当作众多文化中的一种,从而有意地摆脱“西欧中心论”外,他还有意识地不采取三分法,也就是有意识地不同意以欧洲历史为依据来划分世界历史,这也是反对西欧中心论。他认为,西欧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西欧土地上竖起一根固定的标杆,并以此为轴心,让历经几千年的许多伟大历史和遥远的许多伟大文化围着这个标杆低着头转圈,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行星围绕太阳转的体系。把那些包括几千年的希腊以前的文化,与局限于西欧的仅仅几个世纪的历史,随意地纳入一体之中,这非常可笑,完全是强加于人。

吴先生指出,汤因比是对全世界所有文明进行综合考察的第一个历史学家。他生当 20 世纪初年,对客观主义史学的局限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要求能进一步跨越这些局限性。他提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兴趣和活动,要在研究细节的历史和研究完整的历史之间保持均衡”。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做概观,或弄不清楚具体事实,都不能成为历史学家。这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能够相调和的。而在 19 世纪里,直至他所处的时代,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和教育,绝大部分历史学家只是在细节的历史这方面下工夫。这些人探寻各国政府档案,习惯于把历史看成各国有文献可据的历史,因此便成了档案文献的囚虏,而忽视对历史做概观。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非常灵敏的眼光用在观察树木,而不是观察森林。因此,他有责任把森林再度带回到人们的视焦之内。

汤因比打破了近代西方史学中的国别史局限;在研究方法上打破了 19 世纪西方史学偏重于搜寻文献、进行狭小的专题探究的学风,注意细节历史和全局历史之间的平衡,不断把观察的焦点放在历史全貌上。从世界史编纂意义上说,这是确有可借鉴之处的。

#### 四、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反思和展望

对各个时代世界史观进行回顾后,吴于廑先生也对中国史学界的世界史思想和世界史学科体系进行了反思。从时间上看,1964 年他发表《时代与世界历史》一文,可能就是他在与周一良先生共同主编出版 4 卷本《世界通史》后的思考与总结。他明显地感受到了苏联的世界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影响。在对以往世界史编纂和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 1980 年代国内学界要求改变世界史体系的呼声中,吴先生认为,从全局来看世界历史的整体世界史观正在中国兴起。整体世界史是属于“前景中的事物,是已经隐约可见并有可能实现的事物”,好比“初春季节打开窗口,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世界史的前景也是这样一种依稀在望的情景,已经略见端倪。他做了如下反思与展望<sup>①</sup>:

第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历史学科中应是有限定意义的。其探索目标是世界由古到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这个世界史的探索需要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作基础,作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囊括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和一切地区的历史,不是一口大麻袋。也不是包容一切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总汇。不能把中国史和世界史视为两门平列学科,中国史可以和法国史、日本史、埃及史之类并列,都属于国别史,但国别史不应该与世界史平列。世界史也不是国别史的总汇,其探索目标也不是国别史相加起来的目标。

第二,将某民族或某地区视为世界中心的思想,不符合我们所说的世界史探索目标,从事世界史的研究,必须超越民族狭隘性。这种将本国视为世界中心的思想,不仅西方人有,我们中国人也有。利玛窦带来西方人绘的世界地图,中国只占偏东一块地方,我们的老祖宗就不高兴,他们从来认为自己位居世界中央。其实我们今天还有这种思想的潜在影响。当我们看到西方人认为自己是近代世界中心,于是也有人情不自禁,以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也可列为那个时代的世界中心,从而拔高自己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就类似于克罗齐所说的怀乡病史家。我们研究世界史的时候,要预防这一毛病。

第三,一部世界史不宜只讲或主要只讲客观规律发展的统一性。先不评论那些讲统一性的观点在

<sup>①</sup>《吴于廑文选》,第 32~35 页。



哲学上正确与否,世界史决不只是为了说明统一性。当然那些讲统一性的体系(如汤因比文明体系、苏联世界史体系)也讲多样性,但这种讲只是为了补充统一性。因此,这些体系对世界史的看法仍然是西方从18世纪以来就有的看法,即认为世界史是各国历史或各文明历史的总汇,当然多了一点,就是贯注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共性概念的总汇。这是一种在学者头脑里保持得相当强的思想惰性,应当克服。

第四,作为整体的世界史,应该探索和说明这样的主题,即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这个主题也只有它能够说明。历史学的其它领域可以为说明这个主题提供必要的条件,但说明这个主题却不是它们的任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整体的世界史观,应当把研究和说明这一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前述两大体系,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摆到主题的地位上。



今天,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已广为国内学界接受和推崇,也享誉国际史坛,这说明吴先生展望的愿景正在实现。吴于廑先生曾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文章的结尾处,将昆明滇池西山龙门的石刻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改成“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界”,体现了他研究世界历史所力图达到的一种极高境界<sup>①</sup>。作为吴先生的弟子,我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更感到一种责任,应将吴先生创立的整体世界史观贯穿于教学科研之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037。Email:laker-xf@hotmail.com

朱 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吉林 长春 130024。

安长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徐 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037。

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 300387。

● 责任编辑:桂 莉

<sup>①</sup>1982年10月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史昆明年会召开时,我们几个研究生曾跟随吴先生前往参会学习。2011年春节期间我有机会再次游览西山龙门,特将这副对联拍照留念,用以缅怀先生、勉励自己。